

CCTV10

百家讲坛
LECTURE ROOM



郑和下西洋

马骏杰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郑和下西洋

马骏杰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和下西洋 / 马骏杰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 - 7 - 5095 - 7537 - 6

I. ①郑… II. ①马… III. ①郑和下西洋 - 研究
IV. ①K248. 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2033 号

责任编辑: 潘 飞

责任印制: 刘春年

责任校对: 黄亚青

版式设计: 丁丁图文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 010-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 010-64033436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16.75 印张 226 000 字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7537 - 6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88190744

反盗版举报热线: 88190492 88190446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涉及明代中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无论学者从哪个角度入手研究它，都会获得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军人研究郑和下西洋，最关注的莫过于它的军事价值。郑和船队首先是一支力量强大的海军舰队，它的人员组成百分之八九十是军人，它的船舶是代表当时中国最先进造船技术的战船，它的航行编队，带有明显的战术色彩，它的统帅是具有卓越才能的军事家，它出海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耀兵异域”实现世界和平。如此显明的军事特征，无疑为我们借鉴其军事意义提供了指导。郑和下西洋的军事价值主要表现在：

第一，它诠释了科学技术与军事之间的关系。自明朝建立以来，经过两代皇帝的努力，社会逐渐走向繁荣，科学技术较之前代有了较大发展，尤其在造船和航海方面，逐渐跃居世界前列，传统木帆船的制造技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各地船厂相继建立，建造出了五千料的巨舶。航海方面也是继承了宋元以来的丰硕成果，将“定量航海”推向了极致。最先进的技术往往



首先应用于军事，在郑和下西洋时期也不例外，无论是宝船质量、船载武器，还是航海技术，都体现了明代的最高科技水平。这是符合科学技术是军事技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这一基本原理的。

第二，它诠释了外交与军事之间的关系。外交和军事是处理国家关系的两种手段，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即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缺一不可。在一定情况下两者可以偏重，但决不可偏废。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在于理顺亚非国家之间的关系。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有力保障，使郑和无论在处理暹罗和满刺加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还是抑制锡兰山国的强权行为上，都表现得从容不迫，底气十足。如果失去了郑和船队的强大支撑，仅靠外交手段想换来“天书到处多欢声”的生动局面，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三，它诠释了海上力量与沿海国家盛衰之间的关系。郑和下西洋是明代初叶中国国力兴盛的表现和结果，离开了一定的国力支撑，郑和下西洋决不可能维持二十八年之久。同样，国家的强盛，也离不开像郑和下西洋这样能够推动国家开放、交流，不断走向发展的重大举措的实施。从反面看，郑和下西洋中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力的趋弱，带来的后果也必然是对国力增强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郑和下西洋体现了中国古代海权的含义和特征，因为海权是沿海国家利用和控制海洋的能力，海权的兴衰是沿海国家兴衰的晴雨表，正因为如此，郑和下西洋的兴盛废止，必为今日海权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第四，它诠释了和平与战争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平与战争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人类世界，不存在没有和平的战争，也不存在没有战争的和平，战争是和平的重要保障。郑和船队在七下西洋过程中，共进行了三次战斗，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都是为和平而战，它不仅没有违背大明朝“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的基本方针，反而是维护这一方针不

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实践证明，这三次战斗都是必要的，没有它，就不可能使和平航线从东南亚延伸到西亚乃至非洲，没有它，就不可能实现郑和下西洋的终极目标。

仅仅从军事角度入手，我们就可以发现郑和下西洋具有如此丰富的历史价值，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价值就更不待言了。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历史宝库。

然而遗憾的是，郑和下西洋的价值在几百年中被严重低估，对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研究也已是百年前的事了，即使在建设海洋强国的今天，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学术层面，未能向大众广泛普及；大中小学的教材难见郑和下西洋的内容；高等学校开设郑和下西洋课程者凤毛麟角；官方的研究机构寥寥无几。这使我想起了十多年以前出现的“孟席斯现象”。加文·孟席斯是英国皇家海军一位退役军官，他为了弄清郑和下西洋的真相，耗费十四年的时间，遍历世界各地，走访了世界上许多重要港口，考察了九百多家博物馆和图书馆，最终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郑和船队在第六次下西洋时发现了美洲大陆。这一结论在欧洲引起了巨大轰动，因为它可能改写世界历史。然而当孟席斯满怀热情来中国阐发他的观点时，却受到冷落，原因是“对于大部分中国媒体记者和历史专家而言，孟席斯的理念近乎荒唐”，这种现象被人称作“孟席斯现象”。先不说孟席斯的观点是否正确，单说一个退了役的外国军官，以他职业的敏感性，以他探索海洋的精神，以他超乎寻常的研究方式，去追寻中国古代一段辉煌历史的真相，这种精神就足以令每一个中国人钦佩，更何况他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有可资借鉴之处。然而事实上，一方面是学术界对孟席斯观点的强烈质疑和大加挞伐，一方面是社会上对孟席斯其人其事的漠不关心，这些都暴露出国民海洋意识的淡薄。

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开讲《郑和下西洋》，目的就在于以

我个人的微薄之力，以《百家讲坛》这个联系大众的平台，宣传和普及郑和下西洋，增强国人的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特别是配合党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宣传，让国人充分理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意义。我在《郑和下西洋》系列节目讲稿基础上扩充而成的《郑和下西洋》书稿，其指导思想也是如此。但愿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实现我的初衷。

马骏杰

丁酉春于山东烟台





001	第一章 不翼而飞的档案	165	第七章 垂问《郑和航海图》
021	第二章 明成祖的心事	183	第八章 海上生命曲
049	第三章 统帅的才能	199	第九章 有朋自远方来
085	第四章 无与伦比的团队	215	第十章 独特的贸易
119	第五章 宝船之谜	229	第十一章 文明播四方
137	第六章 超级船队	243	第十二章 郑和逝世之谜

第一章

不翼而飞的档案





明朝成化十三年，亦即公元1477年，宪宗皇帝朱见深做出一个重要决定，要组织船队下西洋。这个时候已经距离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过去了整整四十四年了，宪宗皇帝为什么要重提下西洋呢？这是因为自明朝政府终止下西洋以后，中国同海外诸国的关系渐渐疏远，大明朝在海外的威望远不如前，东南亚地区的局势又开始动荡起来，朱见深为重振大明朝往日雄风，便想到要再次组织船队下西洋。既然要重拾下西洋，借鉴郑和七下西洋的经验就显得特别重要，于是朱见深给有关衙门下令，尽快整理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特别是要找到郑和的《航海日志》。可是，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当兵部尚书项忠派人进入兵部档案库查阅这些旧档案的时候，发现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档案已经不翼而飞。项忠大怒，鞭笞了查阅档案的官吏，限他三天之内找到档案，但最终结果仍然一无所获。没有找到档案，再次下西洋也就成了泡影。

从发现档案丢失的那一刻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五百多年了，档案依然没有被找到，人们不得不为档案的丢失而感到惋惜。一代又一代关注郑和下西洋的人们还抱着一线希望继续寻找档案，除了在浩如烟海的明朝档案史料中仔细爬梳以外，还到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去寻找蛛丝马迹，然而都一无所获。那么，这些在二十八年间积累起来的下西洋的珍贵档案文献，究竟去了哪里呢？

一、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去了哪里

明朝万历年间出版了一部书，名叫《殊域周咨录》，这部书共二十四卷，以编年和纪事本末相结合的体例，全面介绍了我国东南西北边疆及周边国家的历史情况，仿佛是一部明代万历以前的中国对外关系史，其中也谈到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情况。这部书的作者是当时颇有名望的职业外交官严从简。严从简在谈到写这部书的目的时说：写这部书的时候，我赋闲在家中，对一百年以前的旧事兴趣非常浓厚，于是就开始追踪郑和下西洋的旧迹，搜寻史料，最终理出了若干线索，完成了此书。这部书最引人关注的地方，是它在琐里、古里卷中，第一次披露了郑和下西洋档案的去向。书中这样写道：

二十二年，仁宗即位，从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诏停止西洋取宝船，不复下番。宣德中复开，至正统初复禁。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答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宝下西洋费钱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而何追究有无哉！忠竦然听之，降位曰：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严从简：《殊域周咨录》）

这段记载表明，永乐二十二年，即公元1424年，仁宗皇帝即位，应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停止了郑和下西洋。到了宣德年间，又进行了第七次下西洋，到了正统初年，下西洋再次被禁止。成化年间，有宦官迎合皇帝的意思，把郑和下西洋之事讲给皇帝听，皇帝遂下诏索取郑和出使的航海资料。兵部尚书项忠命令官吏进入兵部档案库巡检旧有档案，但没有找到，原

因是被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起来了。项忠不知情，便鞭笞官吏，令他三日内入库找到档案，可官吏依然没能找到，刘大夏也并未吐露真情。项忠质问入库官吏：“库中的案卷怎么能丢失呢？”站在一旁的刘大夏说：“郑和下西洋耗费了数十万钱粮，军民死了上万人，即使从海外获得了奇珍异宝，对国家又有什么益处呢？”于是一气之下将档案销毁。

严从简，字仲可，号绍峰，浙江嘉禾人。他的《殊域周咨录》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刊行的，由于他的身份是职业外交官，人们对他的说法毫不怀疑，从此以后，刘大夏毁掉郑和下西洋档案的说法得到广泛传播，一直延续了五百多年。一些著名学者、明史专家、史地专家都相信这种说法。人们普遍认为，明代政府有严格的档案建立和管理制度，二十八年积累的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卷帙浩繁，如果不是由内部知情人有意销毁，绝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严从简的记载是符合逻辑的。

最早引用严从简说法的是向觉明先生，他在发表于《小说月报》1929年第1号的一篇题为《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的文章中指出：

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这种大规模的远征队，其创始经营、出发，以及沿途情形，历次文移，如果文献俱存，一定很有可观；于研究十四、十五世纪亚洲西南部的历史和海运一定也有莫大的价值。可是距今才五百年，当时的公牍等等，便不可考了。顾起元说道：“旧传册在兵部职方，成化中中旨咨访下西洋故事。刘忠宣公大夏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载必多恢诡谲怪、辽绝耳目之表者……”

在引用了这段话后，向觉明先生接着说：“历史上像刘大夏这类焚琴煮鹤的道学先生真实不少，实在令我们考史的惋惜不止。”无疑，向觉明先生对刘大夏毁掉郑和下西洋档案深信不疑。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清华学报》1936年第11卷第1期上发表了《十



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一文，其中写道：

四十年后，有太监迎合宪宗（公元1464—1487年）的意思，到兵部查宣德间郑和出使的水程，再作远征海外的壮举，为台谏所阻而罢。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答吏，复令入检，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

在这里，吴晗先生全部引用了《殊域周咨录》中的记载，以表示对其中所述内容的认同。

新中国成立以后，众多学者、明史专家、史地专家、中西交通史专家等，无不将《殊域周咨录》的记载奉为信史，加以广泛引用和传播，使刘大夏销毁郑和下西洋档案的“罪行”成为确凿的事实。

然而，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一些新史料的发现，使史学界对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的记载产生了诸多疑问，尤其对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这一部书中载明刘大夏情节极为相似的两次隐匿档案材料行为表示极大的异议，由此得出结论：郑和档案不可能被刘大夏所毁。理由有三点：

第一，《大明律》严厉处罚毁档案者。

《大明律》的《吏律》中有明确规定：

凡弃毁制书及起马御宝圣旨，起船符验，若各衙门印信及夜巡铜牌者，斩。若弃毁官文书者，杖一百。



郑和档案中毫无疑问包含着《大明律》所规定的这些文件和物件，比如圣旨、印信、符验等。刘大夏作为兵部郎中不会不知道《大明律》的规定的，怎会冒着杀头的危险去销毁档案呢？如果真是刘大夏销毁了郑和档案，他又怎会安然无恙地继续做官呢？后来刘大夏官至兵部尚书。从这一点上看，刘大夏销毁郑和档案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严从简的记载有移花接木之嫌。

在《明史·刘大夏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汪直好边功，以安南黎灏败于老挝，欲乘间取之。言于帝，索永乐讨安南故牍，大夏匿弗予，密告尚书余子俊曰：“兵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子俊悟，事得寝。（《明史》卷一百八十二）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这样一个事件：成化十五年，即公元1479年，安南王黎灏侵略老挝，但被老挝打败，明廷太监汪直好大喜功，向成化皇帝进言，安南这个国家经常欺负别国，现在可以趁安南被老挝打败的机会，去攻打安南。皇帝采信汪直的说辞，索要永乐年间明军征讨安南的文牍，刘大夏得知这个消息后，有意将文牍匿藏起来，不予提供，并密告兵部尚书余子俊说：一旦战争打起来，西南边境形势就会无法收拾。余子俊恍然大悟，遂支持刘大夏的做法。这样，皇帝看不到文牍，也就打消了征讨安南的念头。

刘大夏藏匿征讨安南的文牍这件事，在很多史籍中都有记载。比如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徐乾学的《明史列传》、傅维麟的《明书·刘大夏传》、王世贞的《兵部尚书刘大夏传》等等。那么，刘大夏的这一行为按照《大明律》是否会获重罪呢？当然不会！因为《大明律》《刑律》中有这样的规定：“凡遗失制书、圣旨、符验、印信、巡牌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找回遗失物，“限内得见者，免罪。”也就是说，刘大夏的行为是“藏匿”，而不是销毁，并且藏匿了一段时间，很快又交出来了。这样的行为在《大明律》中是可以免罪的。

现今的史家认为，刘大夏藏匿征讨安南文牒的情节，与严从简记载的刘大夏销毁郑和档案的情节非常相似，特别是严从简将刘大夏毁掉郑和下西洋档案一事叙述完毕后，紧接着说了这样一段话：

按灼艾集中刘大夏为兵部郎中，有中官用事，献取交南策，以中旨索永乐中调军数，公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书，余子俊力言阻之，事遂寝。与此相类，因附记以俟考。（严从简《殊域周咨录》）

这说明，连严从简本人也对其他史料中记载的刘大夏藏匿征讨安南文牒一事，以及自己所叙述的藏匿郑和下西洋档案一事是否同出一源，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所以今人认为其有移花接木之嫌，也是理所当然的。

第三，刘大夏的墓志铭中没有记载。

刘大夏去世以后，他的好友林俊为他撰写了《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赠太保谥忠宣刘公神道碑》的碑文，也即墓志铭，其中写道：

公讳大夏，字时雍，东平刘氏……中书主事，职方郎中，车驾，而复为职方也。名逾起中贵人献取交南策，索故籍，匿其籍……

这段话记载的就是当时有人给皇帝献策征讨安南，索取文牒，被刘大夏藏匿的这件事。但碑文中没有关于刘大夏销毁郑和档案的记载。碑文的作者林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是朝廷名臣，也是刘大夏同时代的人。他写的墓志铭是对刘大夏一生所作的盖棺定论，这一定论，因他的职位以及与刘大夏的密切关系而具有更高的可信度。销毁郑和档案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在墓志铭中没有记载，说明刘大夏真的没有做过销毁郑和档案的事情，他藏匿的只是永乐年间明军征讨安南的文牒。

除了以上这三个理由以外，刘大夏所任的职务也使他无法接触到兵部所藏档案，也就没有条件销毁郑和下西洋档案。刘大夏中进士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出任职方主事，九年任职方郎中，十一年任车驾郎中，十五年任职方郎中。其中，车驾郎中“掌卤簿、仪仗、禁卫、驿传、厩牧之事”；职方郎中“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之事”。也就是说，车驾郎中是不接触兵部档案的，只有职方郎中才与兵部档案打交道。成化十三年，亦即公元1477年，宪宗皇帝朱见深要重拾下西洋的时候，刘大夏的职务是车驾郎中，说他此时销毁郑和档案，的确是很牵强的。讲到这里，结论也就出来了：郑和下西洋的档案不是刘大夏销毁的。既然如此，那么郑和下西洋的档案究竟去了哪里呢？

二、郑和下西洋档案去向推测

在漫长的时间里，人们始终无法找到郑和下西洋档案的去向，它似乎已经成了一个不解的历史之谜。然而，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寻。我们依然可以根据其他史料的记载，对郑和下西洋档案的去向做一些推论。

在明朝万历年间出版了一本书，名叫《酌中志》，作者是宫中的一名太监，名刘若愚，他把自己在宫中几十年的生活见闻、掌故等加以汇集，写成这本《酌中志》。明代人吕毖又从中选取部分内容编辑成《明宫史》，刊行时作者仍为刘若愚。由于这本书的内容是作者的亲力亲为，可信度很高，受到时人的关注。在这本书中，刘若愚记载了明代宫内文书、字画、古今书籍、手卷、发文簿、收文簿等等文档的管理情况，我们根据这些情况，可以对郑和下西洋档案的去向做一些推断。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凡司礼监经厂库所藏祖宗累朝传遗秘书典籍……自神庙静摄年久，讲幄尘封，右文不终，官如传舍，遂多被匠夫厨役偷出货卖。



拓黄之贴，公然罗列于市肆中……。即库中现存之书，屋漏泔损，鼠啮虫巢，有蛀如玲珑板者，有尘霉如泥板者。放失亏缺，日甚一日。若以万历初年较，盖以十减六七矣。（刘若愚《明官史》）

这段记载说明，司礼监所藏之历代典籍，由于管理不善，遗失太多，其中不乏珍贵文献。文中“神庙静摄年久”一句，是指明神宗朱翊钧，即万历皇帝多年不上朝，他在位四十八年，有二三十年不理朝政，任凭朝中大臣自为，有的衙门近乎瘫痪。皇宫大内管理人员乘机不作为甚至胡作非为，纵容手下偷窃国宝。库中的书卷，更是常年无人悉心管理，因为漏水、鼠咬、虫蛀、霉变等原因造成的损失，有十之六七。可见当时对档案管理的糟糕程度。书中还提到，皇宫中多次失火，殃及存放档案的库房，烧毁了一些典籍。我们以这种情况推想，司礼监如此，兵部档案库是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存在的话，那么郑和下西洋档案的消失，很有可能与此有关。

除此之外，明末战争不断，北京城内屡次大乱，李自成近百万大军进京、清军进京、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等一系列战事，无不令明宫中档案屡遭涂炭，使得二百七十七年明代档案，如今仅存四千余件，兵部档案仅剩明末年间档案，如郑和下西洋这样的早期档案，如何能在战火中幸免？

总而言之，郑和下西洋的档案永远地消失了。

讲到这里，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记录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档案全都消失了，那么我们今天还能全面了解郑和下西洋的真相吗？

笔者可以这样说，郑和档案的丢失，给我们今天全面认识郑和下西洋带来了很大困难，甚至留下许多未解之谜，这是肯定的。但是，横跨近三十年的下西洋活动除了档案的记载以外，还必然留下若干痕迹，比如当事人的记录、时人的碑刻、郑和航海留下的遗迹等等，这些文字和实物载体，虽然不是档案，但与档案一样，它们都包含着丰富的信息，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对这些信息的研究和分析，史学家们依然能够弄清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基本史实，也可以还原一些历史真相。